

「胡宗南將軍與民國」學術討論會紀要

陳佑慎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

在中國傳統正史紀傳體例的影響下，人物史料的徵集、人物事蹟的書寫向來深受各界重視。國史館基於現行「褒揚條例」規定，更有義務徵集及典藏人物史料，截至目前為止，已建置超過一萬二千餘筆的個人專檔。2015年抗戰勝利70週年之際，故陸軍上將胡宗南哲嗣總統府資政胡為真，公開捐贈胡宗南史料予國史館，內容包括日記、文稿、函電、證書、文物等珍貴史料。這批史料經整編、數位化、出版等工作後，確能提供學術界、社會各界更佳的查詢、閱覽及多元應用。今年（2016年）適逢胡宗南120歲冥誕，為了向國人介紹及推廣館藏民國人物史料的運用，國史館特於3月30日舉辦「胡宗南將軍與民國——數位史料文物特展暨學術討論會」活動。

3月30日活動開幕，由國史館館長呂芳上、胡宗南哲嗣胡為真資政致詞。繼之由中央通訊社社長樊祥麟介紹該社新刊《百戰忠魂——胡宗南將軍圖文傳》（王立本著、胡為真審訂，2016年3月出版）、臺灣商務印書館營業部暨編輯部經理高珊介紹《胡宗南先生文存》（胡宗南著、胡為真增訂，2016年4月出版），嗣由國史館審編處處長張世瑛介紹館藏胡宗南將軍數位史料成果。旋進行座談會，座談貴賓計有前行政院院長郝柏村、王曲聯誼會會長董萍、王曲聯誼會秘書長孟興華、胡宗南主持大陳防務時代之秘書陳和貴，以及張書信先生等胡宗南故舊。由於參加活動的胡宗南故舊、部屬人

數極多，場面甚為熱烈。

同日下午，續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張力主持討論會，先後由國史館修纂處助修蘇聖雄、吉首大學歷史與文化學院特聘教授王立本、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林桶法、國史館修纂處助修陳世局發表論文。由於胡宗南係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第一期畢業，身經東征、北伐、安內、抗戰、戡亂、保臺諸役，既是國軍建軍史上的關鍵人物，也是中華民國從戰亂走向和平的重要見證者。各篇論文的提出，確有助益於近代史研究的推展。

首先，蘇聖雄的〈胡宗南與靈寶戰役（1944年6月）〉一文，以抗戰後期豫湘桂會戰（日方稱「一號作戰」）期間，日軍分兵對潼關地區進行試探性攻擊的事例，進行討論。這次戰役的結果，國軍最高統帥蔣中正對胡宗南曾有許多批評，內容涉及部隊訓練、軍隊風紀、領導統御等，範圍十分廣泛。蘇文對蔣氏的批評，一一剖析。例如，蔣氏曾責胡宗南未能積極反攻。實則，國軍對日軍事情報蒐集不佳，無法獲致足夠的確實情報，此非胡宗南的個人問題。第二，蔣氏又責胡宗南越級指揮作戰，致使軍事組織無法發揮層層負責之效。實則，國軍高級將領頗多缺乏大兵團指揮的素養，越級指揮作戰亦為普遍現象，此仍非胡宗南的個人特點。尤有甚者，即使是最高統帥蔣中正，也常對前線進行「遙制」，學界早有論及。再如，隨著戰局進展，曾使部分人士深疑胡宗

南部隊缺乏戰力。實則，胡宗南所轄部隊雖多，卻多屬收編部隊。其間能投入靈寶戰役者，更未能對日軍形成數量優勢。總之，若僅以靈寶戰役評判胡部戰力，並非充分。

蘇聖雄總結指出，胡宗南在靈寶戰役的指揮，其實已經盡其人事。與其他國軍指揮官比較起來，胡並非突出，卻也絕非下乘。而是役日軍雖號稱達到戰役目的，其實遭受相當損失，難說勝利。當然，胡宗南之貢獻並非在於部分宣傳所聲稱的，成功阻遏日軍進入關中，解除重慶大後方承受的威脅。其貢獻是在於，胡宗南軍隊對日軍的節節抵抗，使日軍認知到倘繼續進取關中，將消耗大量兵力，遂不得不放棄對關中的進一步攻擊計畫。

抗日戰爭結束，胡宗南部隊很快投入了國共戰爭，1947年春天的延安戰役堪稱當中的重要一頁。王立本的〈胡宗南與延安之役（1947年2-3月）〉，即以此戰役為主題。王立本指出，蔣中正及其領導的國民政府當局，對於攻取中共根據地首府延安，一舉剷除中共中央，進而在全國戰局中取得決定性勝利，曾經抱以厚望。戰役爆發後，國軍精銳盡出，將士用命，在付出重大犧牲後終於攻取延安，也使中共軍事力量遭受相當程度的打擊。國軍既已攻占延安，不獨蔣中正深感欣慰，胡宗南一時間尤其受到中外矚目。

可是，中共西北野戰軍主力在延安易手之後，成功進行轉移，在陝北與國軍繼續纏

鬥。就此而言，延安戰役的結果，只是大西北漫長鏖戰的開始。王立本認為，當中可注意的是，國軍的強大火力與空優，確非當時共軍所能承受。共軍在經過 5 日寸土必爭的頑抗後，必須選擇撤出延安，乃是勢所必然。其次，若就全國戰局言，國軍之進攻延安，占領土地抑或殺傷共軍理應是次要考量，真正重要的是能否達到「斬首作戰」（借用今天術語）效果。但很明顯地，中共黨政軍首腦順利轉移至陝北的高山深谷中，繼續指揮全國的戰事，不啻宣告了國軍的斬首作戰未能奏功。

王立本總結指出，胡宗南對延安戰役得失，其實知之甚明。但無論如何，1947 年 3 月的延安戰役依舊有著指標性的意義，國共和平談判達成民主憲政的可能性至此徹底破裂，雙方只有將內戰進行到底。而此役之後，國軍等於又開闢了一個新的陝北戰場，兵力的調配難免捉襟見肘。至於對中共來說，在陝北的深溝凹谷中面對國軍優勢兵力的搜索，仍須如履薄冰，謹慎從事。因為只要稍微大意，共軍不無遭受國軍捕捉之虞，其結果可能是萬劫不復。所以，延安戰役並未造成國共戰爭全局的決定性結果，只能說是下一階段的展開。

胡宗南部隊攻取延安後未及兩年，國軍在內戰戰場上的優勢已被逆轉。處此情勢，胡宗南部隊亦難支撐。幾經波折，該部於 1950 年春覆滅於川、康一帶，胡宗南僅能偕同少數僚屬赴臺。由於胡宗南過去統兵眾



論文發表人王立本教授（攝影／林本原）

多，且負方面重任，其軍事之失利不免遭致若干物議，甚至一度受到監察院的彈劾。殊出外界意料的是，胡宗南不願多所自辯，而是一本軍人守土與反攻大陸之責，建議在東南沿海進行反攻。1950 年代初期，胡宗南化名「秦東昌」，出任江浙人民反共游擊總指揮，主持浙江外海大陳島的反共武裝，就是這份心情的展現。林桶法的〈胡宗南與江浙反共救國軍（1951-1953）〉一文，以此為主題，一方面敘述胡宗南主持江浙反共救國軍期間的作為與貢獻，另一方面也討論江浙反共救國軍的困頓與問題。

林桶法指出，1949 年 4 月下旬共軍渡過長江以後，國軍部隊陸續轉進至滇緬、海南、舟山、大陳及臺澎金馬等地區。除此之外，許多地方相繼成立反共游擊隊，惟多數的番號、指揮凌亂，組織亦甚鬆懈。1950

年，中華民國政府為統一游擊區部隊與游擊工作之指揮運用和發展，決定加以整合，並遴選人地兩宜，具有號召能力之人士擔任總指揮。江浙反共游擊隊方面，胡宗南的角色甚為重要。胡宗南在大陳期間，主要的表現是整訓，將沒有組織的散兵游勇，組織成有戰力的游擊部隊。如此，不但解決沿海一般居民的困擾，也使國軍增加一份戰力，牽制共軍的攻臺意圖。其次，將游擊部隊制度化，從編制到薪給，使游擊隊納入國家的管理。其三，與美國方面合作，雖然有時為戰略問題產生爭論，但終能取得一致的策略。第四，1951年9月至1953年7月間，指揮反共武裝突擊中國大陸共39次，並多次擊敗俘獲當地共軍。

從結果論，胡宗南並沒有藉此達成反攻大陸的宿願，甚至亦不能使國軍達成保衛大陳的目的。但林桶法認為，就冷戰格局整體而言，反共游擊隊的作為對臺海局勢猶有不可忽視的影響。其次，和其他來臺國軍高級將領相比，胡宗南的作為已算不錯。胡宗南先以總統府戰略顧問身分，派赴大陳主持反共游擊隊，回臺未久又轉任澎湖防衛司令，顯示他確有相當過人之處。而胡宗南對蔣中正忠心不貳，蔣中正也視胡宗南為心腹，蔣謂胡「忠貞自勵，尚氣節，負責任，打硬仗，不避勞苦，不計毀譽」，允為中肯之論。

討論會的尾聲，由陳世局發表〈胡宗南與部屬關係的建立及維繫〉一文。蓋數十年



論文發表人林桶法教授（攝影／林本原）

來，胡宗南領兵作戰，主持部隊整訓，曾經帶領過的部屬不可勝數。許多部屬在胡宗南逝世以後，寫下不少紀念性、回憶性文字，紹述胡宗南事蹟。另外，胡宗南在抗戰期間於西安王曲主持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七分校，培訓出不少國軍幹部，當中多人在1990年代編撰套書《王曲文獻》。如此一來，產生許多圍繞在胡宗南的文本，這是其他國軍將領、軍事機構不常出現的現象。陳世局一文，就是利用前揭紀念性、回憶性文字，並參照《胡宗南先生日記》（國史館出版）等史料，敘述胡宗南對部屬關係的建立及維持。

陳世局指出，胡宗南與部屬的關係，建立在上下隸屬與師生的雙重關係上。因此，胡宗南對部屬嚴格的軍紀要求與軍事訓練的規範，並沒有使部屬官兵及軍校學生產生

離心力，反而彼此間形成團結與互信的關係，這與胡宗南個人的領導風格與以身作則的身教有極大關係。而胡宗南與部屬的情誼之所以歷時長久，則是基於胡宗南能做到善待部屬、關心部屬，對部屬及其眷屬予以照顧。這種關愛部屬的行為，確實是終其一生的。不惟如是，胡宗南對部屬的關愛，不是鄉愿式的討好部屬，而是雪中送炭式、將心比心式的為部屬著想，站在部屬的立場，為其傷難救助、安定生活，甚至澤及眷屬，使部屬無後顧之憂。亦唯有如此，才會在胡宗南逝世多年以後，仍有眾多舊屬基於真摯、坦誠的心情，長時間興辦各種紀念活動。

隨即，討論會在與會來賓、學者的熱烈

發言中，劃下了休止符。同一時間，國史館於2樓展廳規劃的「民國人物數位史料特展——胡宗南將軍文物」，亦已順利開幕，展期將持續至本年6月30日。此次特展，依據史料的性質，配合胡宗南的相關史事，劃分為「總說」、「海疆前線」、「西北柱石」、「浮世情緣」等數個主題，分別展示胡宗南在大陳島、中國西北的活動，以及個人情感世界的相關史料。透過前揭的活動與展覽，一方面展現國史館典藏、管理人物史料的成果，一方面也使參觀者回眸、反思胡宗南在歷史長河中的身影——這不僅是一頁國軍軍史的縮影，更與國家的命運息息攸關。



討論會會場一隅，立者為胡為真資政（攝影／林本原）